明代大文豪杨慎的谪滇之旅及文化贡献

他关心民生疾苦，游历山川风物，广交诗文友人，留下大量文化遗存，为推动云南汉文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窦 薇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为明代大文学家杨慎的词作。“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作以慷慨悲壮的基调折射出高远深邃的人生哲理，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因其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千古绝唱。杨慎谪滇36年，为云南地方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文学领域的成就为推动云南汉文学及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生平及谪滇经历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杨家四代人一共出了7个进士，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因“大礼议”事件（反对明世宗嘉靖皇帝尊生父为皇考的违制之行）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36年，直到明穆宗时才被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被追谥“文宪”。杨慎治学严谨、著述等身，在经学、史学、方志风俗、金石文学、音韵考据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明史》称其“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杨慎谪滇期间，泛览云南之山川风物，著述《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诸书，让云南之美传扬天下。他于嘉靖四年（1525年）到达昆明，30多年的时间辗转于昆明、永昌、大理、安宁、建水等地，尤其人生的最后10余年，在友人毛沂的邀请下，定居于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居所题名为“碧峣精舍”。于此地，杨慎著书讲学、雅集酬唱，其所修撰《云南山川志》赞美西山“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印澄波，云横绝顶，滇中一佳境也。”西山之美历历在目，西山之景饱游沃看，杨慎用心、用情之所描绘的西山美景广为传唱。

杨慎一生经历人生大起大落，是非成败，禀性刚直、博览第一，谪戍生涯成就了他，虽遭贬谪，但云南之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抚慰其心，令其自足、充盈、淡然、平静。

关心疾苦 体恤民生

杨慎谪滇期间，虽无显赫官职，但依旧关心民生疾苦。永昌享有“玉出腾越”的盛名，明朝廷因之索取宝石为贡赋，盘剥百姓，中饱私囊，手段残酷，令百姓苦不堪言，由此酿成“石祸”。永昌著名诗人张含写下长诗《宝石谣》，诗中刻画了嘉靖王朝对永昌百姓的盘剥“自从嘉靖丁亥岁，采买官临永昌卫。朝廷公道给官银，地方多事民憔悴。民憔悴，付奈何，驿路官亭虎豹多。”杨慎随之也创作《宝井篇》以作应和。“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两诗都真实反映了明代成化、嘉靖年间宝石开采给永昌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对百姓的同情。

杨慎心系百姓、怜悯天下苍生的情怀体现在他谪滇期间的诸多事迹中。目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修浚海口碑记”为杨慎关注民生疾苦的另一见证。《升庵年谱》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时年六十三岁。四月，海口修竣”。“海口”为滇池咽喉之地，每年雨季淤塞水涨，淹没土地。1550年，疏浚海口的工程不仅劳民伤财，且两年之后又有人提出重新疏浚海口，云南巡抚赵炳然不明实情，仍允准，百姓不堪其苦，怨声载道。为此，杨慎在深入了解人民疾苦之后，给赵炳然写了《与巡按赵剑门论修海口书》，直陈利害，此事后来终于作罢，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

才华横溢 至真至纯

杨慎博学，于文学为优，诗作2500多首，诗歌多包含在《升庵诗集》《南中集》《南中续集》《七十二行戍稿》等诗集中，这些文学作品多是谪滇后创作。他主张性情不离，以情为本及性情之真，这是对传统诗学“诗言志”与“诗缘情”之观点的继承。杨慎的诗学主张体现在与友人王廷表的梅花唱和诗中。

梅花诗成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时杨慎为先生祝寿，一日赌成梅花诗各一百首存世，后世辑录为《明杨升庵王钝庵先生梅花唱咏百首》。诗歌为唱和之作，反映了中原主流文学在西南边陲的广泛影响。二人梅花诗描绘了梅之时令：早、新、老、古；梅之形态：孤、疏、矮、瘦、未开、半开、全开；梅之色彩：粉、白、红、胭脂、绿萼；梅之品种：杏、腊、风、烟、千叶、鸳鸯、岁剪、双瓣；梅之傍景：盆、瓶、岭、江、溪、谷、钓矶……诗歌重寄托、寓意，重写实、审美，以“离形得似”之笔写尽梅之神韵。

陈田《明诗纪事》云：“升庵诗，早岁醉心六朝，艳情丽曲，可谓绝世才华。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此番记载描述了杨慎诗风的前后变化。前期追模六朝诗风，后期之作多为游滇之感悟，渐入苍老、平淡之境。滇云山川风物抚慰了其流放之痛，促成了一代文豪的伟大成就。

播扬文化 誉满天下

杨慎的博学与才情随着在滇游历的丰富，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是建立滇云文化圈。杨慎入滇推动了主流文学家与云南文人的交流。清代杨琼《滇中琐记》云：“升庵在滇，与滇之士夫文字交密者，有（保山）张含、（大理）李元阳、杨士云、（昆明）胡廷禄、（阿迷，今开远）王廷表、（晋宁）唐锜六先生，与升庵合称‘滇南七子’”。“滇南七子”是围绕在杨慎身边的文人圈子，他们的文化交流行动推动了云南汉文化的繁荣。

二是丰富了汉文学著述与推动文化教育。云南两次文风大振，其中一次就是杨慎到云南。据《新纂云南通志·滇人著述》记载，明代以前，云南的文人学士、著作甚少，升庵充军云南前，云南只有20多人写有著述40多种。杨慎被贬永昌后到明崇祯末年（1644年），在这120余年期间，云南文人学士涨至150余人，著作多达260余种。杨慎对教化滇人，开启边地学风具有重大贡献。

三是留存文化遗迹。杨慎在云南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如昆明碧峣精舍、安宁云峰山馆、大理写韵楼、开远状元馆、保山铁楼等。此外，杨慎足迹所至之处，也留下了大量石刻、碑刻。嘉靖七年（1528年）杨慎受李元阳之邀同游点苍山，二人皆留下笔墨，是为“点苍山记”，现碑刻已不存，记载于万历《云南通志·地理志》……杨慎所到之处，文化播扬，名满天下，推动了云南汉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改革开放45周年 云南故事

大营街的集体致富路

杨燕

“云南第一村”的巨大牌坊矗立在云南玉溪市大营街村的街道上，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大营街村创造共同致富奔小康的纪录和荣誉。改革开放以前，大营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子，地少人多，人均田地0.38亩，吃粮难、饮水难、住房难、行路难等问题非常突出。乘着改革的春风，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敢想敢干，从建筑队起步，带动了一大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大营街村很快成为了“中国农村富裕的榜样”。

祖辈留下的农耕这条路有点窄，村里的年轻人暗暗下定决心“要到田地之外找出一条路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开始有了发展。20多岁的大营街村民任新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带着二十几个人组成建筑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他们自带工具，出去搞房屋修缮。可是当时的建筑队，一无设备，二无资金，想要继续下去十分艰难。没有办法就拼命想办法，他们通过贷款购置塔吊、搅拌机，改善技术装备，内部实行承包计件制，业务逐渐从房屋修缮拓展到承担施工、水电安装、装饰等工程。靠着政策的优惠和自身的苦干，第二年便还清了贷款。按当时承包规定“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建筑队除了发工资、交国家税收、上交集体管理费，任新明还能得到20多万元收益。他把这笔钱投在了建筑队的发展上，没几年工夫，建筑队由2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在内部分配收益达60余万元。

少数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建筑队主张将这些收益如数用于集体发展。一开始，队里的人对此不理解，通过队干部耐心做思想工作，大家明白了，只有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才有前途，全村人也才能过上好日子。此后，他们用建筑队积累下来的资金，为集体建盖了3800多平方米的房屋，购置了价值20多万元的汽车、拖拉机等设备，欣然办起了农机修理厂。大营街村越干越好，相继有了芝麻片厂、红砖厂等20多个投资小见效快的集体企业。村里几乎没有闲置劳动力，大家都进集体企业上班，就这样，大营街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

怎样才能更进一步发展，让日子奔小康呢？大营街村建筑队从承接建盖简易民房，发展到可以承包高层楼房和厂房建设，特别是承包了烟厂扩建厂房的基建工程后，优质的基建质量得到了玉溪卷烟厂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云南卷烟行业快速发展，但卷烟所需的水松纸需从国外进口或省外购进，滤嘴棒的原料丝束也全靠进口。大营街村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在玉溪卷烟厂的大力支持下，集资430万元，建起了玉溪市水松纸厂、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

曾经担任过建筑队分队长、总队长职务的大营街村村民何金星带领大家，引进生产设备，在省外厂家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咬紧牙关钻研新技术、试制产品，经过上百次的试验，终于攻克技术难关，生产出了“红塔山”“阿诗玛”等名烟的辅料合格产品，这些产品还销往四川省、贵州省、福建省等地区。卷烟滤嘴棒的原料丝束每年都有大量浪费，大营街村兴办滤嘴棒分厂，搜集烟厂废弃的丝束，利用烟厂的旧设备重新加工处理，生产出可供1.5万大箱卷烟的滤嘴棒。所生产的滤嘴棒，各道工序灭菌程度均达到国家要求，填补了云南省滤嘴棒和滤嘴棒涂料纸的空白，被省烟草公司列为全省唯一的定点厂。玉溪市水松纸厂、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当年见效益，实现收入390万元。这两个工厂技术起点高、装备新、产值高、销路好，使大营街村的集体企业产值、利润、管理和规模跃上了新台阶。在这样的带动下，红塔青年纸箱厂、红塔铝箔纸厂、红塔铝型材厂、红塔家具厂等一批新兴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营街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以卷烟配套工业为主、建筑建材为辅的工业集群。1992年，大营街的农村经济总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云南第一个“亿元村”。1995年，大营街农村经济总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被誉为“云南第一村”。

“口袋”富起来后，大营街村建起了统一规划设计的现代化居民小区，人均住房面积近40平方米。统一投资建设了幼儿园、中小学、敬老院、大型公园和商业城，群众家用的蔬菜、肉食、鸡蛋等由集体定量供应，能免费用上液化气，看上有线电视，社区服务保障体系也逐步健全，大营街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乡镇企业是实现农村小康的一条重要道路。大营街村的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云南乡镇企业崛起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云南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促进了云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营街村抓住改革机遇，从本地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进行集体经济改革，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走出了一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成功之路。在这样的探索实践中，如今云南农村改革进一步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大营街居民小区 本报记者 雷桐苏 摄

阿露窝罗节的和谐文化意蕴

杨泠泠 张睿莲

阿露窝罗节是阿昌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阿昌族人民在迁徙、征战、狩猎、农耕和手工劳动等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以祭祀、歌舞为主要活动内容，涵盖历史、宗教、民俗、艺术等重要文化信息的传统文化活动，被列入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节日中必唱的《遮帕麻与遮咪麻》早在2006年就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遮帕麻和遮咪麻》创世神话史诗，是阿昌族口述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全诗1300多行，内容包括造天织地、人类起源、补天治水、降妖除魔、重整天地等几个部分，基本情节分为12折，每一折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被誉为“阿昌族历史的歌”。阿昌族创世始祖遮帕麻和遮咪麻的故事在阿昌族民间家喻户晓，千百年来一直规范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成为阿昌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

从节庆仪式看，阿昌族举办阿露窝罗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感谢传说中遮帕麻和遮咪麻的创世之功和多次挽救人类，为民除害、造福后人的恩情。每年初春，桑建花盛开之时，阿昌族要舞狮、甩象脚鼓、蹬窝罗，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在丰富的节日活动中，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分享喜悦和幸福，从中领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氛围。

在“天公地母传人种”的段落中讲到，遮帕麻与遮咪麻相互敬佩，他们经过滚磨盘、烟火相交等天意的验证，结成夫妻。九年怀胎，九年临产，方生下一颗葫芦籽，他们将其种在门旁。九年发芽，九年开花，九年结果，结成一颗磨盘大的葫芦。遮帕麻剖开葫芦，跳出9个小娃，便是汉、傣、白、纳西、哈尼、彝、景颇、德昂、阿昌9个民族，从此人类繁衍。美好的神话史诗告诉我们，汉、傣、白、纳西、哈尼、彝、景颇、德昂、阿昌等各民族本是一母同根生，血脉相连、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应该团结和谐、共同发展。

如今，阿露窝罗节已逐渐演变成为大型群众性迎新春文化娱乐活动，并充分发挥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从阿露窝罗节的发展变化来看，有几个创新之处。

*一是立法保障。*阿露窝罗节是通过政府和阿昌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于20世纪80年代，由“阿露节”和“窝罗节”整合成为阿昌族最盛大的节日，在增强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增进同一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整合、创新的节日场域，以及在获得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情感交流、互信互认、互通互融，逐渐消解了本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的隔阂，推进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深层心理认同，促进本民族内部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进步，牢固树立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繁荣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仪式固化。*整合了阿露窝罗节跨越民族分布的区域局限和文化界限，成为阿昌族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节庆仪式中，原来分属于“阿露节”和“窝罗节”的不同活动类型，在整合和创新中被规定和固化为“阿露窝罗节”的必备要素，形成不断强化的共同活动形式和民族记忆。即在原来的差异中，用统一“民族节庆”的发展创新模式，通过节日作为媒介来增强民族间的认同。与此同时，无论在何种节日活动中，都要在开幕式上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个议程已成为“阿露窝罗节”最突出的仪式之一，将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固化下来，体现了阿昌族对祖国的感恩与同心同德的情感。

*三是内容创新。*阿露窝罗节的庆祝活动，在保留了“蹬窝罗”、祭祀、对山歌、舞狮龙、民间武术、青龙白象舞、象脚鼓舞等传统内容的基础上，也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文艺汇演、各类竞技比赛、篝火晚会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级文旅部门对阿昌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整理，对“蹬窝罗”的舞步动作进行了改造和规范，并加入鼓、锣、钵等乐器伴奏，使这种古老的传统舞蹈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传统的“蹬窝罗”和“阿露”，逐渐由民间自发转而由政府主导、文化行政部门组织、群众参与的新格局。

阿昌族“阿露窝罗节”的不断传承与创新，是认真贯彻落实“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工作主题的具体实践。是整合创新民族节庆仪式，持续引领各民族思想行为和观念的有益探索。同时，通过这一形式，持续增强不同地域同源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地区和谐稳定发展。

［作者分别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民族传统节日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2BMZ025）阶段性成果］

阿昌族群众欢度阿露窝罗节 张彤 摄